



列強在中國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K25/55

# 列 强 在 中 国

（上）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张宏翔  
书名题字：李延沛

## 列强在中国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12/16·字数118,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200

---

统一书号：11093·86

定价：0.47元

##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曾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是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她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后面。这种严重的后果，至今仍留有斑斑的痕迹。今天，当我们满怀信心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不能忘记那苦痛的过去。

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并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同时，它们还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采用了一系列的压迫手段，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妄图实现其瓜分和灭亡中国的迷梦。

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威胁和政治讹诈，强迫中国的反动政府签订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从中攫取到“领事裁判权”、“租界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殖民特权。它们不仅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还掀起了一个从强占港湾、抢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和侵吞领土，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的驻华公使、领事以及它们卵翼下的海关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和形形色色

的帝国主义分子，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践踏中国的主权，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更在中国开矿建厂、设立银行、修筑铁路、侵夺内河航行权等侵略活动，把中国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场所，进而使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帝国主义不仅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等重要部门，而且从财政金融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中国经济的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sup>①</sup>它们的传教士在中国进行蛊惑人心的传教活动，发展教会势力。它们举办各级教会学校、发行报刊、开设医院、办育婴堂等所谓“慈善事业”，从精神上麻痹中国人民，泯灭民族意识，涣散革命斗志。它们还竟相盗窃和掠夺中国历代的文物，破坏和摧残中国灿烂的古老文化。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是罄竹难书，本书所涉及的仅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压迫、奴役的一些侧面。

为了不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主权的践踏，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蹂躏，对无尽宝藏的搜刮掠夺；为了不忘记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人民残酷压榨的悲惨历史以及地狱般的马牛生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奋发图强，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三页。

国，我们编写了这本历史读物。

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以姓氏笔划为序）：《侵吞领土》是石箴，《买办》、《海关与总税务司》、《驻华公使》、《银行》、《铁路》是刘兴华，《片面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行权》、《报刊》是孙孝恩，《鸦片贸易》、《领事裁判权》、《租界》、《教会学校》、《医院和育婴堂》是徐枫，《势力范围》、《厂矿》、《掠卖华工》、《传教士》、《掠夺文物》是黄海泉。其中《鸦片贸易》和《买办》二题是在张连起同志提供初稿的基础上改写的。为了统一全书体例，各题完稿后，由徐枫同志加以整理和总纂。

本书在编写中，吸取了史学界同志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掌握的资料也不够丰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热忱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 目 录

### 写在前面的话

租 界.....	1
领事裁判权.....	11
海关与总税务司.....	19
驻华公使.....	29
片面最惠国待遇.....	37
鸦片贸易.....	46
买 办.....	56
掠卖华工.....	64
侵吞领土.....	72
内河航行权.....	85
铁 路.....	93
厂 矿.....	101
银 行.....	110
势力范围.....	119
教会学校.....	128
传 教 士.....	137
报 刊.....	147
医院和育婴堂.....	156
掠夺文物.....	167

## 租 界

“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在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政府在我国重要商业城市中强占一定的地区，做为他们居住和管理的地方。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这一地区里，实行了完全不受中国行政系统管辖和法律制度约束的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租界”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开始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界”，以上海为最早。上海开埠后，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于1845年胁迫上海道台官幕久订立了《上海租地章程》，在上海强占了“租界”。随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也先后在中国一些城市强占“租界”。到1904年将近六十年间，英、美、法、俄、德、日、意、比、奥匈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我国的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鼓浪屿（位于福建省厦门附近）等十六个城市占有“租界”<sup>①</sup>。如在上海设立“租界”的有英、美、法三国；在天津占有“租界”的有英、法、俄、德、日、意、比、奥匈等国；在汉口，英、德、俄、法、日也都有“租界”。

“租界”有两种：一是“公共租界”；一是单一国家的租界，如“英租界”、“法租界”等。“租界”的面积和界址

① 严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四九一五三页。

在《租地章程》中都有所规定。但帝国主义侵略者往往用“重订章程”和“越界筑路”等种种卑鄙手段不断地扩大“租界”的范围。所谓“重订章程”，就是侵略者不经中国有关当局的同意擅自改订章程，扩大“租界”的面积和延长界址。所谓“越界筑路”，就是侵略者在已划定的“租界”范围外面，修筑连接“租界”的马路，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就在马路两旁强占土地，建造房屋，而后“租界”当局就把这块土地做为“租界”的一部分扩展过去。“租界”的面积，就是在帝国主义非法扩展中不断地扩大。如上海的“英租界”，1845年的“租地”面积是八百三十七亩，1848年英领事阿礼国借口“青浦事件”<sup>①</sup>迫使新到任的上海道台麟桂重订章程，一次就扩大面积近二千亩，合计共达二千八百二十亩。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界”合并，统称为“公共租界”。1899年“公共租界”又强迫清政府扩大“租界”范围。这样，它的面积由原来两者之和的一万〇七百六十七亩扩展到三万二千余亩。在天津，各国“租界”的面积最大时达二万亩，超过旧城面积的七倍。在帝国主义扩展“租界”过程中，中国人民曾不断地掀起反扩展的斗争，如上海人民在1851年和1862年当殖民强盗准备开辟“第二跑马场”和修建“第三跑马场”时，当地农民群众进行了不屈的反抗斗争。1916年法帝国主义欲在天津强占老西开为“租界”，激起天津人民，特别是“法租界”工人的反抗。是年11月，“法租界”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坚持五、六个月，沉重地打击了法帝国主义，使其扩展“租界”的阴谋未能得逞。

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租界”里实行了一整套殖民主义制

① 参考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八六页注②。

度。它们在“租界”里取得了土地的“永租权”，在这里修筑房屋、开办学校、医院、修建教堂、设立银行，而且建立反革命武装，设置军营，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里，中国人民不但不能占有土地，而殖民强盗还蛮横地规定：除了为外人做工的中国人外，都不得在“租界”内居住。帝国主义还在上海、天津“租界”里设立了统治机构。如上海“英租界”，在1854年设立了市政机关——工部局和警察机构警务处。1864年上海道在“租界”里设立的“会审公廨”，实际上是侵略者控制的审判机关。汉口的“洋务公所”（辛亥革命后改为洋务会审公所）、厦门、鼓浪屿的“会审公堂”和“会审公廨”是同一性质的机构。

所谓“工部局”，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在“租界”的殖民政府。在“工部局”之上设有董事会——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下设警务、工务、财政税务、交通、学务等十几个委员会。此外，有总办事处，以及商团、警务、卫生、工务、教育、财务等办事机构。“工部局”的组织形式在各“租界”里虽有所不同，但领事是当然的统治者则是一致的。这个由侵略者组织的殖民政府，有财政、税收大权，而且可以命令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国人纳税。

“警务处”，就是“租界”内的警察局，下设巡捕房。如上海“公共租界”里除中央巡捕房外，尚有虹口、老闸等十三处巡捕房。1930年警务处共有四千八百多人。“租界”里的巡捕房是戕害中国人民的场所，里边有各种刑具，还有监狱和水牢。一些人往往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残遭酷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装进麻袋扔入长江。

所谓“会审公廨”，是“租界”里奇特的审判机关，成为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压迫中国人民的暴力工具。根据“规定”，由它审理“租界”内中、外人之间的诉讼，并由中、外法官共同审理，实际上是以洋人的意志为法律，清政府的“谳员”形同虚设。辛亥革命后，上海的“会审公廨”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把持。

帝国主义通过“租界”内的统治机构，就完全享有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警察权和财政权。实际上“租界”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也就等于“国中之国”。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以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口吻毫不隐讳地宣称：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帝国主义在“租界”里建立的一套相当完整的殖民体制中，还包括一支反革命的武装。如在上海，就建立一支由英国常备军官统率的，由英、美、俄、日等国侵略分子组成的“万国义勇队”。这支反革命武装于1853年建立后，逐步扩充，由1879年的一百八十一人到1927年扩大为二千二百三十八人，有轻骑队、机关枪队、水巡队、日本队、美国队、俄国队等建制。同时，帝国主义军舰一直停泊在黄浦江上，它们的海军陆战队根据需要可以随时登陆。历史证明：这些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曾多次在“租界”集结出动，与中国反动势力相勾结，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853年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就是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的。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当英勇的太平军逼近上海时，英、美、法侵略者就以它们在上海的“租界”为据点，网罗组织一支反革命武装，不仅在上海外围设防，用武力阻止太平军的进攻。同时，又组织以美国政治流氓华尔

为头子的“洋枪队”和中法混合的“常捷军”，勾结清朝封建统治者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

“万国义勇队”这支反革命武装由1870年起划归工部局管辖，成了由工部局总董直接指挥的一支殖民军队。正是这支“较之任何国常备军，无可逊色”的殖民军队，参与镇压了上海人民的革命运动，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人民。

“租界”是帝国主义用来控制中国经济和财政命脉的堡垒，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集中区域。因为“租界”大都设在通商口岸里，也就成为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转运中心；同时，各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也大都在“租界”里。它们在“租界”内开设银行、设立工厂和公司、洋行等，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残酷地剥削和压榨中国人民。如在天津，帝国主义“租界”是集中在旧城东南以紫竹林为中心的海河两岸。帝国主义为了便于经济上的掠夺，在海河两岸兴建了许多码头、仓库、银行和其他各种建筑。当时的对外贸易业务，如汇兑、仓储、海运等方面的经营，绝大部分操在外商之手，尤其海关大权为帝国主义所掌握。它们利用天津港口的有利条件，大量掠夺我国的各种物资，倾销它们的工业产品。在汉口，1892年有洋行四十五家，1905年增加到一百一十四家，1932年达一百四十多家。帝国主义通过洋行将洋货输往内地各省，又把内地的农产品集中于武汉，转运出国。再如上海外滩，是帝国主义银行的集中地。自1863年到1903年四十年间，在上海外滩设立的银行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德华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荷兰的荷兰银行以及美国的花旗银行，

最多时曾达数十家。银行的设立，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统治的加强，银行也就成为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代理人。帝国主义通过银行操纵国际汇兑，金银吞吐和金融市场；又通过银行输出资本，修筑铁路、开采矿产、采伐森林、建设工厂、船坞以及“租界”内的公用事业，如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和电车公司等；帝国主义又通过银行对中国历届反动政府进行政治借款，这些借款又都以关税、盐税等作抵押。这样，帝国主义就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并得以支配中国政治。

“租界”是帝国主义在文化思想上麻痹和毒害中国人民的据点。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租界”里设教堂、开学校、办医院、出报纸、发行刊物成立通讯社等做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在精神上麻痹中国人民和培养替它们服务的爪牙。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仅天主教在武汉三镇就有教堂、会所十三处，教会学校和神学研究院十二所，医院三个，教养院、育婴堂九所，有教徒十万多人，占当时武汉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所谓的文化机关又是帝国主义搜集情报的据点。如帝国主义分子卜舫济在1935年让圣约翰大学生物系从事中国昆虫的研究，接着他就将研究报告和标本送往美国。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中，就已发现有三种蝗虫是属于他向美国提出专题报告的二百四十九种蝗虫之中的。

“租界”是中国失意的政客、军阀、官僚、地痞流氓的庇护所，也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革命，扶植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桥头堡。“租界”既成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在人民革命风暴袭击下一些地主、豪绅、官僚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纷纷逃入“租界”。在太平天国革

命期间，江浙一带的豪绅地主就曾大批的逃入“租界”，借帝国主义势力保护自己。一些失意的政客也到这里做了“寓公”。“租界”是一切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帝国主义为了稳住它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由英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伦，勾结长江下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长江中游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搞了一个巩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分裂中国的“东南互保”。所谓“互保”，既是保护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也是保护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豪绅的利益。正是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的侵略利益，一贯干涉和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策划会党起义。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起义前两天，英国侵略者勾结张之洞，查抄了指挥机关，唐才常等二十多人被处死。1911年10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于汉口俄租界内配制炸药，不慎失事。俄国“租界”里的巡捕乘机出动，对革命机关大肆搜查，将起义的文告、名册、旗帜全部搜去，并和清政府地方当局勾结，捕杀革命党人，使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于上海法租界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帝国主义巡捕的搜查，不得不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继续举行。

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群众反帝运动的发展，威胁帝国主义侵略利益时，它们便公开地进行血腥的镇压。1925年上海人民掀起反帝风暴时，各帝国主义惊恐万状。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到“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街头讲演。帝国主义野蛮地拘捕学生，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就拘捕学生一百多人。这时群情更加激愤，齐集捕房门前要求释

放被捕的学生和工人。午后三时许，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当场打死十三人，伤数十人，这就是震动世界的血染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破坏和镇压，并不能阻止人民革命洪流的滚滚向前。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勇敢顽强的斗争，终于在1927年3月胜利地收回了被帝国主义霸占了六十六年的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帝国主义在“租界”这个特区里，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1856年，帝国主义为了便于投机、走私活动和加强殖民统治，在苏州河上造了一座木桥，上海人民把它叫做“外摆渡桥”。这座桥的建造费是一万二千元。桥造成后，帝国主义便把它做为生财之道。它们以“偿还造桥费”为名，对中国人民无一例外的征收过桥费，无理的规定行人每次须交制钱一文，车轿加倍。到1863年过桥税又涨价一倍。此时，“租界”人口激增，每年征收的过桥税，估计总有一万多元。从1856年到1873年前后十七年间，大饱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腰包。再如英商自来水公司从1883年公司成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止，每年平均利润总额是百分之十一点二一。据1948年的估计，公司总产值为五百一十万镑。在它经营的六十六年中，赚得利润的总数，就抵得上同样规模的七点八个自来水厂。

帝国主义在“租界”里还百般的压迫、虐待和侮辱中国人民。上海的法国电车和英国电车都设置了“头等”和“三等”车厢。头等车厢只供洋人乘座，中国人只能乘三等车厢。“法电”内部对于中国工人的歧视更为厉害。“法电”

办公大楼的厕所分为三等，法国人用头等厕所，其他国籍的洋人和中国职员用二等，中国工人只能用三等厕所。如果工人用错了厕所，轻则罚款，重则开除。在汉口“英租界”的章程规定：冬季自下午六时起，夏天下午八时起至翌日天明止，凡华人行经租界，常在租界内往来者，必须携带灯笼，违者解往英国总领事移交中国官员办理。在汉口的“法租界”，就是白天也不许中国人通行，人力车工人进入“租界”，必须穿上象犯人一样的“号衣”，空车不许在“租界”里行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用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由中国劳动人民建造起来的公园，竟不许中国人入内。上海“法租界”公园（即顾家宅公园，解放后改为黄浦公园），公园章程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第二条规定：“有人牵领或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园”。1885年工部局花园管理委员会更蛮横的在公园门口竖起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和对中国人民的凌辱欺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租界”内的娼妓、赌博、贩卖毒品更是受帝国主义保护的公开行当。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卫生检查所公开发卖吸食烟毒的执照，最高价达五十元一张。上海的逸园跑狗场和由法国外交部批准的回力球场，以及比它历史更长，规模更大，排场更加阔气的上海跑马总会都是公开的大赌场。当时的赌客，虽然很多人是属于找刺激、寻消遣、找讹诈对象的剥削阶级分子和大小流氓，但也有小市民和依靠工薪度日者以及一些年青人。他们在赌场的欺骗和引诱下，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都扔在这些赌场里，弄的混身是债，甚至倾家荡产，卖

妻鬻子，更有的投黄浦江自杀。而那些侵略者、流氓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却日进万金，个个腰缠累累，脑满肠肥。当时跑一次马，要赚十六万块银元。最多时，一年要跑几十次。确是吸尽了中国人民的血，装满了帝国主义者的腰包。

“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莫过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租界”就是这样的典型。“租界”是中国被侮辱、被侵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象征，它是人间地狱。

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租界”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但它在近百年来所造成的罪恶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却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